



# 近代天津典当研究

Study on Pawn of Modern Tianjin

冯 剑 / 著



# 近代天津典当研究

Study on Pawn of Modern Tianjin

冯 剑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天津典当研究 / 冯剑著.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1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 - 7 - 5201 - 0038 - 0

I. ①近… II. ①冯… III. ①典当业 - 研究 - 天津 -  
近代 IV. ①F832.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99179 号

·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

近代天津典当研究

著 者 / 冯 剑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荣欣

责任编辑 / 李丽丽 智 烁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近代史编辑室 (010) 5936725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http://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9.25 字 数：314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0038 - 0

定 价 / 8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冯 剑**

1971年生，河北深泽县人。现为河北民族师范学院社会科学部副教授。2009~2012年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学习，获得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城市史。在国家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多篇，曾主持、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若干。

#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大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 内容提要

典当是民间融资的重要方式，也是民间借贷的一种常见形式，在民间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学界对近代乡村典当的研究较为关注，但对近代城市典当的研究有所不足。本书从博弈论等理论视角，对近代天津的典当交易进行了探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天津社会经济的变迁。典当可以分为固定资产典当和流动资产典当。近代固定资产的典当在民间已经形成了一套交易制度，并在清末民国时期民法上有所规定，确立为典权制度。在近代天津民间典权的交易中，典权随着近代市场的扩大和变迁，其传统的济弱和孝道等文化内涵遭到了削弱，家族对典权的束缚也有减弱的趋势。在近代天津民间交易市场中，典权制度为预防风险而日益明晰，与买卖和租借等交易形式一起构成了固定资产典当的内容。到了近代，国家对民间典权的管理也日渐规范和加强。近代天津流动资产的典当主要在典当业中进行。典当业是一种以抵押借贷为主的兼具多种功能的金融、商业、保险行业。从不同的角度看，近代天津的典当业有多种形态与类别，地方帮派林立，帮派之间矛盾重重，对近代天津典当业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典当业的当息既关系到典当业的生存和发展，也关系到民间社会的利益，在近代为国家、社会高度关注。近代天津的当息一直在国家、社会与典当业间进行博弈。近代天津的典当业资本在全国典当业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在近代天津社会经济的变迁中，典当业的资本逐渐枯竭，典当业的利润减少，这成为近代天津典当业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天津近代典当业衰落的原因还有战乱、社会经济变迁、政府管制、自身形象的变化、当息不断调整、同业恶性竞争、典当业内部组织保守和落后等。同时，典当业人士面对典当业危机应对不力也是其衰落的重要因素之一。

# 目 录

绪 论 .....	1
第一章 近代天津的典权 .....	29
第一节 出典 .....	31
第二节 典后出典人和承典人的权利与义务 .....	41
第三节 典权的消灭 .....	47
第四节 典权与其他民间交易形式 .....	52
第五节 近代国家对典权的管理和规范 .....	62
小 结 .....	74
第二章 近代天津典当业的类型 .....	78
第一节 典当业的沿革与性质 .....	78
第二节 当业的类型和帮派 .....	82
小 结 .....	107
第三章 近代天津典当业的组织与运作 .....	109
第一节 典当业建立的程序 .....	109
第二节 典当业的运作 .....	125
小 结 .....	140

第四章 近代天津典当业当息的博弈史 .....	142
第一节 清末及北洋政府时期关于当息的博弈 .....	142
第二节 南京国民政府前期关于当息的博弈 .....	147
第三节 日伪时期关于当息的博弈 .....	153
第四节 抗战胜利后关于当息的博弈 .....	157
小 结 .....	161
第五章 近代天津典当业资本的变迁 .....	164
第一节 近代中国典当业资本概要 .....	165
第二节 固定资本、流动资本及其比率的变迁 .....	168
小 结 .....	203
第六章 近代天津典当业的衰落与应对 .....	205
第一节 战乱与天津当业的衰落 .....	206
第二节 社会经济变迁与天津典当业的衰落 .....	208
第三节 政府管制与天津当业衰落 .....	214
第四节 天津典当业形象的变迁 .....	216
第五节 天津典当业人士的危机应对 .....	221
小 结 .....	238
结语 .....	240
参考文献 .....	244
附录 .....	254
索引 .....	296
后记 .....	300

# 绪 论

典当是一种在传统民间社会经济中常见的融资现象，是近代民间金融的主要形式之一，长期以来在中国民间社会经济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典当有固定资产的典当和流动资产（以下称“动产”）的典当。土地、房屋等固定资产的典当在中国民间交易中逐步形成较为固定的交易习惯，在民国时期被列入民法，被称为典权。<sup>①</sup> 典权是介于租赁与买卖之间的常见的民间不动产交易形式，广泛存在于民间房地产等不动产交易之中。动产的典当行为一般发生在典当业之中。典当业被称为“贫民的后门”，在古代和近代都是三百六十行中对国计民生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行当。总之，以固定资产为主的典权制度和以动产为主的典当业在近代中国社会经济中占有非同一般的地位。<sup>②</sup>

近代天津城市经历了巨大的转变，作为传统民间经济形式的典当随着城市的发展与变化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迁。研究近代天津的典当业对近代中国典当以及近代社会经济变迁的研究具有典型意义。

## 一 近代天津城市发展变迁与典当

天津地理位置优越，自古便是商业重镇，也是战略要地。它位于九河下游，“为海河之要冲”，“路通各省舟车，南运数百万之漕，悉道经于此。舟楫之所式临，商贾之所萃集，五方人民之所杂处，皇家使者之所衔命以出，贤士大夫之所报命而还者，亦必出于此。实水陆之通衢，为畿辅之门户，冠盖相望，轮蹄若织，虽大都会莫

<sup>①</sup> 在清代典权实践中，未成年子女、粮食、奴仆也是典权的标的物。参见许光县《清代物权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sup>②</sup> 有人指出二者存在不同，“典当与典卖的区别正是建立在物与业的区别之上”。但从社会经济的功能上看，二者则有一致性，“当铺是一种民间金融机构……田宅的典卖确实是民间信贷的一种形式”。参见吴向红《典之风俗与典之法律》，福建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第1页。

能过焉”。<sup>①</sup>

天津既古老又年轻。在战国时期，天津就已经被开发。元代直沽因成为盐、漕以及南北商品交流的中心地区而日趋活跃。明代天津建立卫所。明代后期天津成为支援朝鲜抗日和明政府抗击后金的军事供应基地。天津的漕运地位也得到了加强。<sup>②</sup>

到了清代前期，漕运和盐业的发展使天津的经济地位和战略地位日益提升。漕运和海运奠定了天津北方粮食和商品市场的地位，晒盐技术的改进使天津的盐课占全国的 10%，成为长芦盐务的总汇之处。1731 年设置的一州六县的建制一直延续到清末。对外商业交流也有很大的发展，各地商人的会馆开始在天津建立。<sup>③</sup>

近代天津从一个市镇一跃成为华北第一大商埠，城市化、商业化、市场化的进程非常迅速，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

天津自古就是一个具有浓厚商业色彩的城市。商业人口在道光年间就占了城市职业人口的一半以上。近代早期，天津商业的主体是民间小贩，他们占据了商业的绝大部分。根据 1949 年的人口统计，小商贩和流动商人仍有 11 万，占天津城市人口的 6.3%。<sup>④</sup> 近代天津资本雄厚的盐商、粮商等虽然数量不多，却是当时天津城市经济的支柱之一。<sup>⑤</sup>

进入 20 世纪后，天津商业有了巨大的发展，商店数量有了大幅度的增加。一战后，特别是二三十年代，天津工商业一度得到较为快速的发展，天津进入了城市发展的黄金时期。20 世纪天津城市商业商品化占据了主导地位，这表现为天津成为世界市场的一个部分，商业的经营形式和手段向资本主义转变。新式的股份公司，新式的记账法、抵押等契约方式得以推广，期货交易增加。传统商业逐步被分工细、规模大的近代商业取代，出现了许多新行业。洋行增加，大型的百货商场和中小商店构成了城市的商业网络。1928 年天津大小商店公司 3 万家，资本额为

① 张焘：《津门杂记》，王帛孙、王黎雅校，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第 1 页。

② 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第 29~72 页。

③ 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第 72 页。

④ 刘海岩：《空间与社会——近代天津城市的演变》，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第 225 页。

⑤ 庞玉洁：《开埠通商与近代天津商人》，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第 33 页。

3000万~4000万，从业人口10万人。<sup>①</sup>1930年前后一个在天津的外国人写道：“天津在过去的一两年里的变化真是太快了。有更多的外国人来到租界里居住，其中多数是商人，家境比过去的那些西伯利亚难民殷实多了。”<sup>②</sup>

天津开埠之后，战略地位日益提高。随着天津近代洋务企业的大量建立，天津成为北方洋务运动的中心之一。开平煤矿的建设为天津城市发展注入了动力，招商局的建立促进了天津交通的近代化，铁路的建设使天津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划时代的时期。之后，随着中外经济交往的日益加深，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果从租界这个西方文明的窗口传入，电讯、通信等基础设施的建立把天津和世界联系起来。外资企业逐步进入天津，近代民族企业也开始兴起，官办的产业的资本占了绝对优势（占天津全部近代企业的94.3%）。<sup>③</sup>到1945年，天津市有大小工厂5000多家。<sup>④</sup>

在1911年以前，天津企业相对20世纪以前还是有了较为明显的增加，天津的民族工业在这一时期已初具规模（见表0-1）。

表0-1 1911年前天津各类民族资本企业分布状况

单位：家

门类	数量	门类	数量	门类	数量	门类	数量
矿业	5	机器	10	纺织	28	面粉	12
榨油	4	烛皂	12	火柴	4	皮革	5
制碱	3	瓷器	1	玻璃	1	化妆品	2
交通	1	垦业	—	烟酒	7	其他	11

资料来源：宋美云：《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天津近代工业的发展》，《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第134页。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工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工业结构也有了新的变化（见表0-2）。抗战时期天津的工商业发展进程被打断，企业和

① 李竞能主编《天津人口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第36页。

② [英]布莱恩·鲍尔：《租界生活——一个英国人在天津的童年（1918~1936）》，刘国强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第141页。

③ 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第218~262页。

④ 李竞能主编《天津人口史》，第247页。

资本数额都呈下降趋势。<sup>①</sup>

表 0-2 1935 年天津市工厂统计

单位：家

机器及 金属制造	交通用 具制造	土石玻 璃制造	化工业	纺织	服用	橡革	饮食 烟草	饰物 文具	印刷 造纸	其他	共计
18	2	7	8	32	6	4	7	1	7	4	96

资料来源：《天津市工厂统计》，天津《大公报》1935年1月24日。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成为外国侵略者对中国从事经济和军事侵略和控制的战略基地，也是中西文明交流的窗口。<sup>②</sup> 天津逐步成为中国北方的经济中心、进出口贸易中心。天津近代崛起的原因之一是其与腹地及其在外贸中所处区位优势。随着对外贸易的增长，天津的经济对内地的辐射能力也日渐增强，20世纪初天津的经济腹地几乎囊括了中国北方。<sup>③</sup> 天津还成为北方最大的土货出口贸易中心。<sup>④</sup> 北方各省的原料和货物大多经由天津转运出口，大量的洋货也经由天津贩运到全国，主要是北方各地。天津与腹地的贸易关系进一步发展，进口和出口的贸易量增加。山西商人也一直是天津进口洋布的最大主顾，每年有300多名山西商人来天津购买洋布回本省。<sup>⑤</sup>

金融是城市经济的血脉。伴随着近代天津工商业以及进出口贸易的迅速发展，对金融的需求也随之增加，典当、印局、钱庄、账局、票号这几种信用机构成为天津在新式银行进入中国之前的最为重要的金融机构。它们不但并行不悖，而且可以互相融资，相互利用。<sup>⑥</sup>

20世纪初期，随着金融业的发展，天津已然成为中国北方的金融中心，银号、中外银行形成了互相补充和竞争的近代金融网络。它们为商人提供借贷资金和押汇业务，成为近代天津城市发展的血脉。<sup>⑦</sup> 农村的资金不断流入天津。地主富户携资入城，是乡村资金外溢的一个重要因素。地

① 天津市社会局编印《天津市第二次工业统计》，出版年不详，第11页。

② 陈振江：《通商口岸与近代文明的传播》，《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1期。

③ 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第205页。

④ 张焘：《津门杂记》，第146页。

⑤ 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第175页。

⑥ 刘建生等：《山西典商研究》，山西出版集团、山西经济出版社，2007，第266页。

⑦ 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第205页。

主富户之所以入城，城市社会经济近代化是诱因之一，如享受城市现代生活或投资工商业等。城乡贸易关系不平衡，是乡村资金外流的又一关键因素。此外，军阀、官僚所积蓄的大量钱财，也多来自农村，是农村资金外流的重要因素。由于上述原因，乡村资金向都市集中的速度日益加快。<sup>①</sup>随着天津工业和交通的发展和天津的腹地不断地扩展，1920年代天津的腹地和交叉腹地总面积达到200多平方公里，超过全国土地面积的1/4，涉及人口1亿多，比20世纪初的天津腹地扩大了1倍，成为全国第二大经济区域。<sup>②</sup>钱庄、银行、牙行、货栈等借贷机构的资金注入，为天津的国内贸易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天津的国内贸易具有很大的地缘性，以血缘、地缘等传统社会关系形成商业帮派，商业和金融业务也有一定的地域和帮派的范围。例如，宁波帮以遍及全国的慈溪、奉化、象山、定海等六县商人为主，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他们以在天津经营运河南北货运生意发家。<sup>③</sup>外国资金随着天津开埠大量注入，天津成为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北方金融中心。外资对近代天津城市的发展也具有一定影响，如1924年，天津典业公会因为壬子兵变后一直没有恢复，要求借贷洋款，以维持营业，并提出了押借、利息以及清偿的具体办法，“商允法商马律利得巴莱达以各典当房产暨各典当本，抵借洋银一百万元或六七十万元”，希望政府与法国方面商议。<sup>④</sup>

伴随天津经济发展与近代化转型的是城市化的提速，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面积不断扩展，工业、金融、服务产业快速集聚，人们生活方式也变得城市化、西洋化。<sup>⑤</sup>

随着天津经济的发展，天津的人口数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开埠通商之后，天津的工商业、对外贸易等获得了较快发展，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一个传统的商业城市发展为一个集工业、商业、贸易、

<sup>①</sup> 李金铮：《民国乡村私人、店铺高利贷利率研究》，李金铮：《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经济探微》，人民出版社，2004，第409~411页。

<sup>②</sup> 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第432页。

<sup>③</sup> 张章翔：《在天津的宁波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7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第67页。

<sup>④</sup> 《当商拟借洋款牵复，天津当商》（1924年），天津市档案馆，档案号：J0128-2-002084。

<sup>⑤</sup> 许学强、周一星、宁越敏：《城市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第36页。

金融于一体的近代化城市。在天津城市化的过程中，周边人口大规模地向天津聚集，1860年开埠以后，各国租界设立和扩张，城区范围不断扩大，人口急剧增加。1846~1906年60年间，城市人口由19.87万增加到42.45万，增长了1.1倍；而1906~1928年22年间，人口从42.45万增加到112.24万，增长了1.6倍，成为华北人口增长最快的城市。<sup>①</sup>

近代天津的人口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近代天津城市内主要分为六个社会阶层：（1）官僚遗老、金融企业名流和投资者以及社会名流；（2）商人、资本家、高级职员；（3）小企业主商人、职员、中间商、教师和一般公务员；（4）手工业者、小商贩、帮头、工匠、工头等；（5）摊贩、季节工、临时工、装卸工等；（6）无业游民、难民、乞丐、娼妓等贫民。<sup>②</sup>

随着城市的发展，人口的素质也在变化。随着西风东渐，原来就是五方杂处的天津城市更加成为一个异质文化的空间。传统文化在这个异质空间中发生了演变。这也使博弈环境和博弈文化背景发生了巨大的变迁。近代天津的传统文化与新文化交相辉映，都有空前发展。近代教育发展很快。尤其是私立学校发展迅速。城市文化、乡村文化和西方文化共同成为天津文化的来源。以报纸为主的大众传媒空前兴盛。通俗文化尤其发达，京剧、评剧、梆子、新式话剧等都在天津兴起，多种文化艺术并存，西式礼俗在天津的影响日益扩大。<sup>③</sup>

天津城市在近代的转型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其中，贫民问题比较严重。1928年城市贫民10万人，占全市人口的10%；到1947年底增至30万人，占全市人口的1/6。有8万赤贫人口达到了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程度。<sup>④</sup>

天津的贫民大多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地区，民国时期天津的主要边缘区是谦德庄、地道外等。<sup>⑤</sup>此外，后来位于城市中心的南市一带，当时是天津贫民的集中区域之一。天津人口死亡率较高，1935年为38.16%，1944年为34.38%。死亡率高的原因是劳动人民生活悲惨。天津城市化迅猛，

<sup>①</sup> 刘海岩：《近代华北自然灾害与天津边缘化的贫民阶层》，《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sup>②</sup> 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第468~469页。

<sup>③</sup> 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第481~488页。

<sup>④</sup> 陈卫民编著《天津的人口变迁》，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第88页。

<sup>⑤</sup> 刘海岩：《空间与社会——近代天津城市的演变》，第287页。

大量贫苦农民不断涌入，贫富两极分化严重。<sup>①</sup>

天津人口结构的巨大变化使贫困问题更为突出。新兴的工人阶层也加入了这支城市贫困大军。人口学家林颂河在 1927 年对塘沽久大精盐公司 614 个工人家庭的调查证实，当时每有 3 个成年人的家庭的一年必需生活费为 241.23 元，平均月需费用 20.10 元。据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关于天津各业工人与工资的统计，1933 年天津市工人中，月工资收入 1~5 元的占 14%，6~10 元的占 31%，另有 16% 的徒工与试工没有工资。就是按上述工资收入较高者 10 元计算，也仅能买 213 斤玉米面或 86 斤大米。<sup>②</sup>这样，年收入在 30 元以下的家庭，大都处于入不敷出的境况。下层家庭很少吃肉，住土坯房，较少用火炉，生活方式有乡村的痕迹。<sup>③</sup>

大量外来的移民也是人口贫困化的原因之一。大量人口移民天津的原因很多，从根本上讲，移民者欲通过移居天津寻找新的职业，摆脱原来的贫困生活或进一步改善其处境。移民天津的时机，或在招工期间，或是在灾荒、战争时盲目流入。<sup>④</sup>根据 1937 年的数据统计，天津人口中本地人大约占一半，其他来自全国各地，以河北省居多，只比本地人少 4 万左右。<sup>⑤</sup>

陈旧的就业观念依然在天津家庭中占主导地位，这也是导致贫困而产生借贷需要的因素之一。天津的一般家庭，除了一两个人外出谋生，其余的人都抱着旧观念，尤其是女性，她们宁可闲着，也绝不想觅一种工作。中层阶级以上的妇女讲求虚荣，要保持那种太太小姐的体面，而下层社会妇女只有很少的收入。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一般家庭的生活困难。<sup>⑥</sup>据统计，没有职业的男性为 26.4%，而女性为 81.6%，有文化的人一度在解放前高达 50%。<sup>⑦</sup>男性失业人口虽远比女性为多，但女性无职业人口远比男性多，男性就学人口比女性多，而不事生产的女性远比男性多。<sup>⑧</sup>

社会风俗往往也导致经济拮据，走向贫困化。位于天津市区的家庭交

① 李竞能主编《天津人口史》，第 154~156 页。

② 李竞能主编《天津人口史》，第 155 页。

③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编《南开指数资料汇编》，统计出版社，1958，第 604 页。

④ 高艳林：《天津人口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第 101 页。

⑤ 李竞能主编《天津人口史》，第 176 页。

⑥ 《津市的中等家庭专仗男子赚钱养家》，天津《大公报》1933 年 6 月 22 日。

⑦ 陈卫民编著《天津的人口变迁》，第 120 页。

⑧ 李竞能主编《天津人口史》，第 248 页。

往频繁，人际关系复杂，日常交际和送礼成为一项较大的家庭负担。<sup>①</sup> 天津社会有厚葬的习俗，仪式繁杂，办理丧事需要很高的花费。<sup>②</sup> 近代天津赌博、吸毒现象等成为社会公害，屡禁不绝。这些问题也是造成城市贫困问题的原因。<sup>③</sup>

大量的贫困人口造成近代天津城市对借贷产生了巨大需求，典当业也日渐发达。正如一首民间歌谣写的：“邀局是老祥，请会是老广，终日无事忙，帮嫖看赌随着逛。崩骗是寻常，花到空囊，不得不借阎王帐，还不上，要遭殃。年节下，更难搪。要帐的，一行一行，估衣铺来闹，靴帽铺来嚷，不干不净……哪知帐主功夫长，自然撞得上。”<sup>④</sup> “当铺营业最发达的时候，也往往是在民生最凋敝的年头。”<sup>⑤</sup> 而在经济萧条的时候，“各贫民亦无处赚钱，度日维艰，既无处挪借而典当各物又不能多得钱文”。<sup>⑥</sup> 只有这时，他们才告别借贷，依靠行乞或救济生活。当铺不仅是一般贫困人口生活借贷的场所，也是一般小商贩融资谋生的重要机构。小贩们常常将其不同季节的衣物储存在当铺中，以换取资金，实现融资，谋取生计。一般的职员们也时常手头拮据，当铺成为他们融资的渠道之一。故此，人们常用的衣物就成为当铺最为常见的当物之一。

随着近代天津城市经济的发展，作为北方经济贸易金融中心和政治中心的天津迎来了商人、企业家以及贵族、官僚、军阀各色人等。他们或从事贸易谋利，或做寓公以谋东山再起。近代天津成为商人博弈的战场和政治中心北京的后院。这些人物在近代天津日常的生活中或一时超支，或投资产业，也常有需要资金的时候，典当铺则是他们时常光顾的场所。古董、珠宝、字画常常是这些人的当物。

近代天津工业的发展使工业产品时常成为抵押品，但在天津当铺的当物中不占主要地位。与近代上海、广州的情况稍有不同，这一方面体现了

<sup>①</sup> 《南开指数资料汇编》，第 604 页。

<sup>②</sup> [日]日本驻屯军司令部编《二十世纪初的天津概况》，侯振彤译，天津市地方史志编修委员会总编辑室，1986，第 126~128 页。

<sup>③</sup> 《天津之风俗调查》，《河北月刊》第 1 卷第 3 期，1933 年 3 月。

<sup>④</sup> 张焘：《津门杂记》，第 104 页。

<sup>⑤</sup> 《漫画典当》，《天津市》第 4 卷第 2 期，1947 年 8 月 30 日，第 10 页。

<sup>⑥</sup> 《中外近事》，天津《大公报》1903 年 4 月 8 日。

近代天津工业发展的相对滞后，另一方面也与当铺的经营管理习俗有关。<sup>①</sup>

与其他行业相比，被称为穷人后门的典当业成为获利最为稳妥的行业之一，吸引了富有阶层的大量资金，当铺也成为下层人群时常光顾的地方。天津民间有顺口溜云：“天津卫，好地方……第一是走盐商，卖的盐，任意铺张，赔累了，还须借帑帐，其次粮字号买手最吉祥……又次开粮店，洋货杂货行，认客投主，有帖应行，拿用也够加一帐。稳是当铺利久长。此外别行，总是本大利广。”<sup>②</sup> 在近代天津，当铺的利润在各行业中位居前茅，与盐业、粮食等一起成为近代天津城市的重要产业。当铺的社会地位也因此受到了重视，在清代“当铺的门口，都好挂一块裕国便民的招牌”，当铺对国家财政有一定的贡献，“别的买卖很少给政府纳税，就是当铺每年纳税，政府也依靠这项税款，把这项税款列为主要收入之一”，故此，“当铺的掌柜都有顶戴，出门坐轿，衙门口推门就进，打起官司来，不论原告被告，当铺里的人一概不准逮捕”。<sup>③</sup> 民国时期，经济环境的变迁使当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没有清代时那么高，政府对当铺的管理也有所变化，<sup>④</sup> 但当铺在社会经济中，尤其是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依然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近代天津典当业的资本在全国主要大城市中名列前茅。近代天津当铺的资本系统也经历了巨大的变迁，成为时代变迁的缩影。清末，当铺的资本多与天津八大家有关系，也有外来的山西商人的投资。天津城市和附近乡村的“财主都有当铺，没有当铺简直就不算财主”。如“长源杨家的当铺，最多时有过二十几家，杨柳青石家，土城刘家，益德王家、李善人家……可以说每家都有几处当铺”。民国之后，军阀成为当铺最为重要的投资者，“有好多当铺由八大家手里逐渐转入了军阀的手里，如曹锟、吴佩孚、陈光远等，都曾有过好多当铺”。抗战后，“这个资本系统又有了新的变迁，目前市面上的当铺，要有不少是旧的字号，但东家与从业人多不是

<sup>①</sup> 上海当业多由徽商主导。徽州典当经营灵活，收当物品中还有农具，业务多元化，拓展了谷押、囤当、吸收存款等。广东典当的业务范围还有机器、原料、货物等，适应了近代工业的发展。参见刘建生等《山西典商研究》，第306、343页。

<sup>②</sup> 张焘：《津门杂记》，第102页。

<sup>③</sup> 《漫画典当》，《天津市》第4卷第2期，1947年8月30日，第10页。

<sup>④</sup> 参见本书“附录”。